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41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21 年第 1 期 · 总第 41 期

热点观察

给企业减负 让市场在保就业中唱主角	1
房地产领域发生系统性风险可能性不大	2
部分地区全员招商引资暗藏后遗症	4
电影业改革“上影范本”：一步先步步先	7
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是效率变革的必然举措	10

学科前沿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应重点推进三个体系建设	15
探索合理有效的数据产权制度	16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19

经管资讯

长三角一体化发力“高铁工程师”加速皖北“洼地创新”	24
专业科技保险为重点创新项目装上“安全垫”	27
促进文化娱乐线上消费创新发展	29

责任编辑：董岳珂

编辑：董岳珂

日期：2021 年 3 月 20 日

给企业减负 让市场在保就业中唱主角

“我们相信，通过经济稳定恢复增长会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而更多的就业岗位会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李克强总理3月11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强调，“我们也很明确，就业还是要让市场来唱主角，也就是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

保就业须从保企业着手，保企业就是保增长，这样的施策逻辑正昭示着就业、企业、市场与增长彼此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紧密联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新增城镇就业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总理更是表达了“希望在实际执行中还可以更高一点”的期待。

对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从保持宏观政策连续稳定，到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培育壮大新动能到坚持就业优先政策继续强化，以就业为首的一系列任务部署已然清晰，各方政策聚力增效稳增长的同时，也将为中国经济应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2021年创造更大回旋余地。

1 兑现全年就业目标游刃有余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也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2020年，唯一被量化“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的就业目标，最终以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的超预期成绩，铸就了2020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2.3%的辉煌成绩，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

2021年，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年度发展目标攸关“十四五”开局，更关系到民生福祉的提升。其中，就业目标的制定与落实至关重要。

“今年新增城镇就业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在预料之内，反而全年GDP实现6%以上的目标设定普遍低于社会机构8%的增长预期。”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开发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黄征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要为宏观经济预留更大回旋余地。“实际上，6%以上的增长也足以支撑11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达成，关键在于一系列围绕就业优先政策的部署与落地见效。”

在黄征学看来，源于持续扩大的就业压力是决策层不断加码就业优先的直接原因。数据显示，2021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将创新高达909万人。此外，还要保障转业军人和农民工就业。“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就业优先的政策显然为社会各界吃下了‘定心丸’。”黄征学说，而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的施策逻辑，也将为市场寻求正向增长坚定信心。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要继续优化和落实减税政策。重申各地要把减税政策及时落实到位，确保市场主体应享尽享。此外，对于着力稳定现有岗位，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汪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其中就包括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带动灵活就业，以及通过扩大投资带动大项目落地创造的就业岗位。

“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干预确保企业更有能力和条件生存下去，刺激消费保障民生，加之国家重大工程、大项目的推进，最终实现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活跃度提升，更推动了市场

自身活力的释放。”汪浩说，由此前瞻 2021 年的市场表现，围绕就业目标部署和推进的经济政策，也将进一步发挥成效，确保目标达成游刃有余。

2 苦练内功积极应对潜在挑战

就业目标的实现和确保企业生存的努力离不开基本面的稳定向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尽管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 年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众多利好政策支持，且随着新冠疫苗的逐步铺开上市、外部环境的有所好转，加之国内发展向上势头对外资的吸引，但这些都不应改变对 2021 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清醒认识。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然是最大挑战之一。黄征学认为，尽管国内情况持续好转，但疫情影响是全球范围的，对外部防控形势仍不能盲目乐观，由此带来对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影响都应纳入考量。

其次，国际环境变化对核心技术以及产业链的影响值得重点关注。黄征学表示，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错综复杂的形势正在加剧影响企业生存以及产业链在全球范围重新布局的潜在可能。

实际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早已被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部署。“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已成为对内恢复发展经济、对外确保经济主权的核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出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和中小微企业协作配套作用。

黄征学认为，核心技术的突破非一日之功，但其本身也酝酿了巨大的产业机遇。同时，客观上也为国内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尽早掌握核心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实际上，去年以来，产业层面已经彰显了企业迎难而上的成果。汪浩介绍，去年的规模工业增加值中，涵盖新能源、微型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出相较于传统工业增长更加积极和正面的表现。

“受制于国际环境变化对产业链冲击的影响，企业应对有被动成分存在，但主动而为更显重要。”汪浩强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尤其是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是对我国国内产业及产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这对尽可能减少受到外部影响，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不可少。因此，苦练内功，积极应对才是正道。

作者：李海楠
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2021-3

房地产领域发生系统性风险可能性不大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还是泡沫比较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比较强。但 2020 年房地产贷款增速数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近年来，房价过高、涨幅过大、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运行一直是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问题。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佩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房地产投机炒作风气较为浓厚。央行调查数据显示，2019 年，我

国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达到 96%，其中有两套房的家庭占比为 31%，户均拥有住房 1.5 套，在全球主要大国中，我国家庭住房拥有率位居全球第一。据此判断，很多人买房的目的并不是自住，而是用于投资投机。

二是房价收入比过高。根据 NUMBRO 国际房价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十大城市中，我国占据一半。房价收入比过高不仅推高了居民部门债务，加大了债务偿付压力，还对消费、教育等活动产生了挤压效应。

三是各类资本竞相进入房地产领域。2020 年以来，在各种贷款利息优惠、贴息政策背景下，部分主体利用获得的优惠贷款进行炒房，部分经营性贷款以各种方式违规进入楼市，这部分资金既无法监测，也加大了风险隐患。因此，多地监管部门严查低息贷（消费贷、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

四是房价过高、涨幅过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长期问题。近期，我国部分城市又出现了房价非理性上涨现象。除了前期需求反弹、供给减少等原因，在如此高价位上还有抢房行为不乏投机炒作的成分。同时，部分刚性需求也被恐慌情绪裹挟，加入抢房潮中。

各国经济发展的教训表明，房地产泡沫化运行对一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负面的。郭树清在发布会上表示，相信房地产问题会逐步得到好转，现在要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措施。李佩珈认为，这释放了中央及政府坚持“房住不炒”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确实存在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的倾向和风险，但这仅是局部的、区域的。从居民住房违约情况（目前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违约率约为 0.3%，违约率极低）、居民储蓄率等多个角度观察，当前，我国房地产领域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她说。

为落实中央“房住不炒”政策，李佩珈建议：一是落实主体责任、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防范各类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二是加快租赁住房市场发展，营造租房比购房更划算的发展环境。实现租购同权，强化租户利益保护，加大对租房税收补贴力度等。三是加大对投机炒作行为的打击力度。

同时，受货币政策更加关注风险、房地产融资政策收紧及无风险利率上行等多种因素影响，李佩珈认为，2021 年房贷利率整体稳定，略有上行。

具体来看，一是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防风险。考虑到 2020 年我国宏观杠杆率过快上行，加大了未来发展中的隐患，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直达性。在助力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将避免杠杆继续大幅上升。

二是房地产融资环境转紧。近期，我国已出台多项政策以避免各类资金过度流入楼市，这将约束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行为，相应的信贷投放将有所减少。

三是无风险利率有所上行。2021 年年初以来，随着疫情在全球趋于缓和以及新冠疫苗接种的加快，各国对经济恢复增长的乐观预期不断上升，这使得各国无风险利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行，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由上年年末的 3.17% 上行至 3.25%，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定价利率也有同步趋升的压力。

作者：王丽娟

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2021-3

部分地区全员招商引资暗藏后遗症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了解到，北方一些地区为发展当地经济，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继续沿用“全员招商”的老法子，发文件、摊指标、搞排名，个别没有像样产业发展的乡镇，头上也压了3000万元的招商指标。一方面兴师动众大搞招商，另一方面企业却因种种原因不愿投资，强行摊派下，基层干部叫苦不迭。



1 财力紧绷 地方招商全员上阵

春节后上班，刘书记在电话里和远在山东的客商们寒暄一番后，终于回归正题：“你们啥时候能来我这里考察？”电话那头表示抱歉：“现在疫情防控态势仍然紧张，考察项目的事先缓缓……”

刘书记是内蒙古一乡镇党委书记。按照他所在市县下达的2021年度招商引资指标，他领到了3000万元任务，年内必须完成。

春节前，他带着一队人马远赴山东拜访企业。“我们希望引进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投资镇里的食用菌产业。”刘书记表示，经过洽谈，有山东客商对项目表示出兴趣，答应春节后来考察。如果招商愿景实现，将很好地延长当地食用菌加工产业链。“人家能否看上还没底，毕竟给不了太多的优惠条件。”

《经济参考报》记者春节前后走访发现，部分地方将招商引资工作当成头等大事，千万元级的招商任务被摊派到乡镇、街道，不少基层干部感到手足无措。

“别人至少有个产业可以出去吆喝，我这儿只有成片的荒地，谁愿意来投资呢？”北方某地区

一名乡长叫苦不迭，他所在的乡几乎没有什么产业，自己却背了 3000 万元的招商任务。他表示，能理解上级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自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狠抓招商工作，这位乡长的上级部门连续出台实施方案、八条措施、考核办法等文件，把市里下的招商引资指标摊派到各个县区及政府各职能部门，有的县区需引进 40 个项目，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最少在 1000 万元，连妇联、教育局、工会等机关也牵涉其中。

东北一县委宣传部王部长苦笑说，连她这样的“门外汉”也有 300 万元招商任务。县里原本财政拮据，还是给招商人员按人头配了 2 万元招商经费，用于“外出跑项目”。

招商考核压力随之而来，从市到县将对干部招商情况进行“一季一排名”，市县两级媒体进行公示，年底考核时领导将以此视为用人的重要指标“调整一批”。“虽说不涉及直接的奖惩，但代表着你能否担当，大家对这个排名还是挺害怕的。”王部长说。

大搞全员招商背后，是一些地区经济增速缓慢，地方财力吃紧。

“再不搞活经济，发展真的成问题了，但必须得有压力，招商任务下得重一些，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一位副县长坦言。

2 营商环境堪忧 请客进门却又关门宰客

部分地区一面大搞“全员招商”，另一面营商环境却令人担忧。牛年上班第一天，内蒙古召开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千余名领导干部观看营商环境“伤心片”，刀刃向内、自曝家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温商会长从富有的富翁变成了负债的‘负翁’。”“办理公司破产，平均需要 690 天，最长的城市比标杆城市多两年半。”“该批不批，该审不审，重点民生工程拖成了瘫痪工程。”“作为直接参与项目的政府工作人员，竟然连土地谁来挂牌这么基本的常识都不掌握。”……

会上播放的暗访短片《营商环境“伤不起”》，集中曝光了当地多个盟市招商引资的负面典型案例。营商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已成为各类市场主体反映最强烈、影响地区形象最突出、制约改革发展最严重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相关部门地区宗旨意识淡薄、法制意识缺乏、服务意识缺位、诚信意识缺失，营商环境反映的更是政治生态问题。

在呼和浩特市开发房地产的“苏商”赵云飞深有体会，当地干部请他从苏州引进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精准、专业、科学的招商引资，引入的项目要通盘考虑地方的基础设施条件、产业承接能力、生态承载能力。”他认为，这种大水漫灌式的招商模式，简单地把发展压力转嫁给个人，就算招来了项目，也不一定能发展起来。

3 有些地区还把招商引资看作“肥肉上门”，动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歪脑筋

一位浙江商人抱怨说，当初自己是被当地优惠的招商政策吸引而来，没想到企业投产一年便被划入自然保护区，被相关部门要求拆除，一度关门停产。“招商引资前投饵喂料，审批建厂时百般刁难，建成投产后就把企业当摇钱树、唐僧肉。”类似“请客进门、关门宰客”等不当招商，已经给当地营商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一面是落后的营商环境，另一面又在全员招商，经济怎么能搞活？地方政府越是这样干，越

是抑制本地市场主体的创新精神和主动精神。”2020年《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报告的牵头人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志学教授说。

对于合理招商，业内专家认为，一方面要以科学的地方产业规划为前提，将招商范围和招商对象限定在合理范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另一方面要做好长期招商方案，合理配置利用招商资源，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此外，要坚持以存量带动增量，通过服务好已有外来企业和企业家，形成良好口碑从而产生好的连锁效应。

4 培育内生动力 破解“发展乏力症”

业内专家指出，类似全员招商等“硬核”举措，旨在为经济发展按下“快进键”，倘若地方营商环境、内生发展动力等问题得不到解决，招商不当将带来诸多隐患。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蔡之兵认为，不当的“全员招商”会增加干部队伍的工作压力和负担，不利于政府机关正常开展工作和发挥其他职能；同时，容易让地方发展陷入路径依赖，只重视招商而忽略其他发展因素，不利于培育新发展模式。“经济健康发展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全员招商’又回到行政主导。”张志学说。

从长远来看，此举还可能招来诸多“副产品”：追求表面数字的虚假招商，“开门迎客、关门宰客”的恶性招商，以及出台过度优惠政策的盲目招商，甚至滋生权力寻租的腐败招商，不仅没能拉动经济发展，反而扣动了“风险扳机”。

风险可以预料，为何“全员招商”现象仍屡屡发生？蔡之兵指出，关键原因在于不正确的政绩观、不科学的发展观和不积极的学习观，一些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过于追求单一的可量化经济指标，对地区发展的实际影响因素和一般发展规律认识不深。尽管基层也在学习供给侧、需求侧、区块链等经济概念，也在宣传新发展理念、强调高质量发展，但问题还在那儿摆着，并没有学透精神，关键时刻没有招数。

部分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到底如何应对“发展乏力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学教授认为，经济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单纯以GDP作为评价标准，应该研究区域分工，寻找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如果策略得当，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也许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所在。

“治疗‘发展乏力症’的关键在于，培育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内生发展能力。”蔡之兵建议，深入研究地方特色和优势，选择地区有能力、有条件、有基础发展的产业，培植出发挥地方优势的企业，不能盲目追求高大上。

同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在蔡之兵看来，一些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短期难以建成完备的产业体系，但营商环境建设完全能以最高标准对标经济发达地区，这是提升地区吸引力、解决发展难题的根本。张志学认为：“打造好营商环境，放水养鱼，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地企业，都能很好地生存发展，经济慢慢不就起来了吗？”

作者：张丽娜 王靖 安路蒙 恩浩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3

电影业改革“上影范本”：一步先步步先

牛年春节档，是疫情重击电影业之后的首个春节档，也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影股份”）实行绩效改革后迎来的首次“大考”。据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统计，2021年春节档（初一至初六）上影股份旗下联和院线总票房突破5.5亿元，相较2019年同期实现大幅度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在压力与挑战下积极改革创新、力求转型突破的上海电影集团，交出的一份充满希望的新春答卷。



牛年新春首个工作日，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带领集团领导班子前往上海影城调研。谈到牛年“开门红”，他说：“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都有劲儿没处使；今年新春新气象，困难虽然大，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招牌”越擦越亮 做大做强全产业链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70多年来，上影拍摄了超过850部故事片、800多部（集）电视剧，培养了新中国几代电影人，作品荣获数百个海内外奖项，“上海电影”是上海文化领域，乃至中国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上影身先士卒，从组建上影集团到做大做强全产业链，在全国电影同行中率先实现了整体转企。“敢吃螃蟹”的上影集团，进一步整合、梳理旗下业务，近年来推动实现了上影股份在国内A股市场以“上海电影”的名称挂牌上市。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集团旗下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二期建设顺利，相关项目将促进产业能级全面提升，推动内容生产。未来的上海影视乐园，将拥有超过10个高科技摄影棚，成为上海科技影都的核心承载

地。

2020年下半年，直面疫情冲击和企业发展需求，上影股份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一方面，以“鼓励创新、激励增量、推行市场化考核机制”为目标制定的2021年度绩效考核方案覆盖到每一名员工，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薪酬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量干部被派往全国一线。

从机制创新到人员保障，上影股份转型发展“加速跑”，才成就了2021年春节档一个个来之不易的数字。这个春节档，整个上影股份体系内有不少员工在忙碌中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按照绩效考核改革精神，依据春节档票房增长数值初步测算，影院员工绩效收入与票房增长挂钩，将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增加员工收入是硬道理。”王健儿说，“十四五”期间，上影集团要通过创新机制，增加员工收入。上影股份绩效改革在春节档初显成效，用数字印证了这一点——好机制释放了员工的创新力，也把员工的心和企业发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比如，上海影城有约1000座的大厅，也有VIP小厅，排片调整是一项格外费时费力的工作。新春佳节，员工们常常到凌晨还在紧盯数据，根据市场数据和口碑情况进行实时调整，最终使牛年春节档票房相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91%。

2 融合发展“破圈” 系统性改革加速升级

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电影产业推到了变革的风口。从产业结构到投融资渠道，从商业模式到人才队伍，系统性的改革转型成为电影行业在“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

“‘十四五’开局之年，上影从改革创新起步。”王健儿说，在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时候，集团酝酿讨论制定了“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制定的目标是到“十四五”收官时，创新业务将占到集团总营收的半壁江山。

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王健儿说，对于电影产业而言，要看到整个产业进入了融合与重塑的新发展阶段，主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打赢这场主动仗。

“近两年，国内新主流电影崛起，体现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显示了中国人文化消费需求与消费力的快速提升，为影院打开了新的市场大门。”王健儿表示，“对于影院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影院的社交属性将更加凸显，文化消费大幅增长是必然趋势。上影要抓住机遇，重新定义‘电影院’。”

据介绍，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诞生地的上海影城，将成为上影新影院的“样板间”。联手银星皇冠假日酒店，整个上海影城板块将变身“上海电影艺术中心”，聚焦新文化、新娱乐、新消费，营造电影时尚街区。

新商业形态需要新商业模式支撑。在蓄力待发的2020年，上影致力于集团内部“生态圈”建设、集团外部“朋友圈”开拓，倡导旗下企业“破圈”，联合集团内外优势资源组建了一批新团队，依托上影数以百计的IP资源，以长三角为重点，强势突进文旅融合发展、公共文化空间运营等，使电影在放映、授权之外，产生“第三波利润”。上影集团旗下车墩影视基地的升级就在此背景下展开，上影通过与业内头部文化团队的资源组合，以“百年上海”为图景，打造主题电影小镇，探索内容与产业的融合发展。

大发展需要大投入，现代文化企业的“资金池”建设也是上影集团关注的焦点。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上影股份2020年组建了产融中心，2021年将更加灵活地采用上市公司配套融资手段，助力优质项目的快速推进。

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要素。王健儿说：“我们需要大批复合型人才加盟，不但需要艺术家，而且还需要金融、管理、法务等跨界人才参与其中。上影集团对未来充满信心，也欢迎更多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加入电影行业。”

3 “创意+制作”齐飞 “上影标准”精益求精

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影集团在这个重要年份，将推出《望道》《1921》《大城大楼》等一系列重大题材影片。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党从上海石库门出发，石库门也是中国电影的“初心之地”。电影界认为，上海电影这一品牌，本身就出自红色文化基因的积淀。进入2021年，在精品内容战略的催化下，上影正全面激活红色大片创作力，进一步完善电影工业的制造力，攀登文艺高峰，出品更多精品力作。

据介绍，上影为《望道》集结了超强“金鸡”阵容。导演侯咏，曾凭借电影《鸦片战争》《我的父亲母亲》《孙中山》《晚钟》，四次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编剧贺子壮，来自上影厂，曾凭借电影《生死抉择》荣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上影厂优秀美术指导李佳，资深录音师吕家进，化妆师沈东生和殷丽华，也都曾多次结缘“金鸡”。

影片主创团队表示，追溯到大约100年前，中国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紧密融合在一起，大家希望通过电影镜头，促成一次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

有70多年历史的上影，是国内影视圈罕见的、拥有产业链完整配置的制片企业。电影行业的“上影标准”不仅是上影人的骄傲，更被中外知名电影人点赞。《1921》导演黄建新曾说：“我们在车墩不是搭景，而是造房子。”在《1921》拍摄“主战场”——上影集团旗下车墩影视基地，上影厂的“老法师”们与华建集团通力合作，花了3个多月，等比例“复刻”了中共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和博文女校等实景。

为了还原细节，导演团队、美术团队花了近4年时间进行考据，在置景之前，制作团队又与导演团队围绕电影的“年代感”“氛围感”多次讨论，从一砖一瓦开始，深化布景细节，“从无到有”地营造出电影需要的年代氛围。

美术、设计、工程、置景，不同团队之间反复沟通，使出了各种绝招。比如，在“中共一大会址”的外立面拼砖工程中，从长三角各地招募了近300名工匠，组成攻坚团队，大显神通。“上影标准”包含着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精雕细刻体现于《1921》等红色大片的拍摄全过程，这也是中国电影人一片拳拳赤子之心的生动写照。

内容创意体现软实力，生产制作展示硬实力。进入“十四五”，上影正在推动“创意+制作”比翼齐飞。

王健儿说，上影将全面实施精品内容战略，激活、充实旗下的影视全产业链资源，打造上影的新主流电影。新的五年，上影将实施“全产业链提升计划”。

在上海市徐汇区永福路52号，上影重启了影视创作中心，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昔日上影厂文学部

的所在地重新挂牌运作。与此同时，上影全力资助了一批电影创投项目，加强对前端优质 IP（版权）、剧本获取和开发的投入，在业内优秀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中进一步拓宽上影合作的“朋友圈”。

在车墩影视基地，上影一边加大力度丰富各种场景，大力投入包括《1921》《繁花》等片场在内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永久外景地，一边加速扩容升级，出资数亿元收购建筑面积 8 万余平方米的昊浦影视基地，加速打造高科技新型影视基地。展望 2021 年，包括 1 个超过 5000 平方米的摄影棚在内，上影在车墩将拥有 10 个摄影棚、全套数字电影拍摄及特效制作设备等软硬件设施，为上海迈向“全球电影创制中心”，为中国电影的振兴与繁荣贡献更强大、更扎实的上影力量。

作者：许晓青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3

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是效率变革的必然举措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九部门印发《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发展思路、原则和目标，规划部署了重点任务、行业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是未来一段时间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的参照依据。

1 开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是效率变革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新背景、新原则和新路径；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工作，是绿色发展之需，是形势变化之选，是效率变革之途。

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效益优先、质量第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效益要不断提升。更可持续，要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成本改善环境质量。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措施，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实现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这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需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举措。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我国宣布了“30-60”目标，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扬和积极响应。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是提高资源生产力乃至碳生产力的重要措施，可以起到减污降碳协同的效果。开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是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这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美丽中国建设必须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前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是保护环境的根本措施，这也是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反思后的创新。大力发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在提高资源效率的同时，也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发展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质量型、气候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建设美丽中国，因而可以收到一举多得之效。

这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应有之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以资源可持续利用来支撑。大宗固废量大面广、环境影响明显、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对降低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资源消耗强度、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意义重大，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

2 突出重点，不断提高大宗固废利用效率

我国地域广阔，大宗固废堆存和新增情况各异，综合利用产品市场需求差异较大，应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手作用，坚持规模化利用与高值化利用相结合，消化存量与控制增量相结合，突出重点与整体推进相结合，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相结合，通过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和企业主体的共同作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存量有序减少，新增得到利用；关键瓶颈技术取得突破，技术创新体系迅速建立；政策法规、标准、相关制度和统计体系逐步健全；产业间融合共生、区域间协同发展；产业基础和骨干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形成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指导意见》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重点聚焦在煤矸石和粉煤灰、尾矿（共伴生矿）、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建筑垃圾和农作物秸秆等领域，应当也必须提高这些大宗固废的综合利用水平。要从实际出发，持续提高煤矸石和粉煤灰综合利用水平，尤其要推进规模化利用；推进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贵金属等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有价组分梯级回收，做到物尽其用；尽可能从冶炼渣中回收稀有稀散金属和稀贵金属等有价值组分；利用工业副产石膏生产水泥和新型建材，在土壤改良、井下充填、路基材料等领域应用磷石膏。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的潜力巨大，要提高分类和回收利用水平，规范堆存、中转和资源化利用场所的建设和运营，鼓励在建筑工程和道路工程中应用建筑垃圾生产的再生骨料及制品，或用于土方平衡、林业用土、环境治理、烧结制品及回填等目的。持续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和基料化利用，农用优先；支持利用秸秆等生物质能供热供气供暖，不断拓宽秸秆原料化利用途径，利用秸秆生产环保板材、炭基产品、聚乳酸、纸浆等，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开展专业化、精细化的运管服务，打通秸秆产业发展的“最初一公里”。

3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大宗固废综合利用

开展产废行业绿色设计，大力发展绿色矿业，鼓励采矿中利用尾矿、共伴生矿填充采空区、治理塌陷区，推动煤矸石、尾矿、钢铁渣等大宗固废在产生的同时就削减；推行绿色施工，实施建筑垃圾分类管理、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推动利废行业清洁生产，加强大宗固废运输过程管理，防止二次污染。依据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建设贮存设施，强化主体责任，实现安全分类存放和规范处置。加大重点流域和重点区域大宗固废的综合整治力度，健全环保长效监督管理制度。

鼓励关键技术创新。重点突破源头减量减害、高质利用、过程风险控制等关键技术。支持产学研用有机融合，纳入国家相关重点研发计划。修订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推进与上游煤电、钢铁、有色、化工等产业的协同，与建筑、建材、市政、交通、环境治理等下游应用的深度融合，打通堵点和痛点。建立联动协调机制，推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的大宗固废协同处置利用。

创新大宗固废管理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推动重点行业、地区和园区建立“互联网+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信息管理系统，鼓励开展综合利用交易信息服务。创新综合利用模式。在煤炭行业推广“煤矸石井下充填+地面回填”；在矿山行业建立“梯级回收+生态修复

+封存保护”体系；推动建筑垃圾“原地再生+异地处理”；在农业领域开展“工农复合”；探索退役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等新兴产业固废的回收、循环利用和高值化利用途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发展新模式。

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不仅需要先进理念引领，更需要付诸切实可行的方案和行动，《指导意见》专门设置了实施行动，包括骨干企业示范引领、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推广、治理能力提升等 4 大行动。

在政策上，将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鼓励公共机构优先采购秸秆环保板材等综合利用产品，引导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加强能力建设，完善标准体系，明确统计口径、统计标准和统计方法，提高统计评价能力，积极推动评价结果采信，引导企业提高资源综合利用产品质量。

作者：周宏春（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21-3

云城租赁破解不动产售后回租难题

2020 年 11 月，上海某公司因缺少低成本的长期资金，以自有工业厂房为租赁物，与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城租赁”）达成融资租赁合作。云城租赁以售后回租模式为企业快速融资，并顺利完成过户登记，承租客户还减免了近 200 万元的增值税及其附加税和近 600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G60 科创走廊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夜景。姜辉辉/摄

据介绍，不动产售后回租项目因标的房产过户所涉及的税种繁多、涉税金额较大、办理流程复杂，且没有过往案例参照，使得行业中此类业务鲜能完成过户。该项目的交易实质为融资租赁，经主管部门批准，参照售后回租业务相关税收政策执行。同时，云城租赁通过合理设计租赁期限，让客户的综合税务成本平摊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促进项目成功落地。该项目被评为 2020 年度上海融资

租赁行业“十佳创新案例”，成为行业不动产售后回租业务的示范项目。

当前，实体企业发展面临着资金周转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流动性是什么？对企业来说，它是现金流，是生命线。有了流动性，企业才能整合资源，投入生产，创造财富。

企业如何获得流动性？除了银行贷款等传统金融手段之外，融资租赁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金融工具，可以通过将企业的动产和不动产作为租赁物，以融资租赁的商业模式为企业融资。

简单来说，企业利用生产设备、运输工具等动产进行融资租赁，这方面的法律、商务、税务、财会、征信等政策支撑和配套服务都已较为完备，执行通畅。但另一方面，利用企业厂房等不动产进行融资租赁，在政策配套和执行落实上还存在一定的瓶颈，难点就在过户问题上。

为什么“过户难”？原因就在于税费高。

不动产售后回租是企业将自有厂房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获得一笔融资款项，同时再从融资租赁公司租回使用，按期交付租金，租赁期满后房屋归还给企业。由于形式上存在两次“过户”，这使得该融资行为在两个环节上均需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与契税等，要承担 25% 的企业所得税，还要额外承担增值税（租赁期间差价的 9%）、可能的巨额土地增值税（租赁期内增值部分的 30%~60%）以及契税（全额的 3%~5%）成本。面对高昂的税费，企业很难通过不动产售后回租来获得融资，只能望洋兴叹。

为此，国家税务总局早在 2010 年就出台相关政策（2010 年第 13 号公告），明文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及有关收入确定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人出售资产的行为，不确认为销售收入。”

“政策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重复计税，促进市场发展。然而不动产售后回租办理过户时，却很少依照这一政策征税，绝大部分的不动产售后回租交易并未实际过户。”云城租赁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果能在征税环节执行上述国家政策，将会大幅减轻企业税负，也会加强交易双方主动过户的意愿，从而对整个融资租赁行业的良性发展和风险防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如，仅以企业将工业厂房出售给租赁公司的过户为例：一栋价值 3500 万元的工业厂房，如果按照一般房产买卖过户交易，出售方企业需要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契税等合计超过 1000 万元的税费。其中增值税及其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占大头，光这两项就得 700 多万元。

如果这笔交易不是普通的买卖行为，而是作为融资性质的不动产售后回租行为，那么按照国家针对融资租赁行业的税收扶持政策，企业缴纳税费仅需约 300 万元。

可以看出，能否享受政策、降低税费成本关系到企业融资的成败。

为此，云城租赁向税务部门提出申请：关于该交易的纳税办理，申请适用国家税务总局 2010 年第 13 号文的规定，即对承租方出售不动产的行为免征增值税，且不确认为销售收入。

没过一周，云城租赁收到税务部门的批复：认定该项目的交易实质为融资租赁，可参照售后回租业务相关税收政策执行。最终，承租企业减免了近 200 万元的增值税及其附加税，以及近 600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税务成本，促成了标的房产的过户登记和交易的最终达成。

这看似偶然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云城租赁多年来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早在 2015 年成立之初，云城租赁就以解决中小微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出发点，明确

市场定位，聚焦服务中小微，并向微端倾斜。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他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他们苦于融资，疲于奔波，成效甚微。而另一方面，融资租赁作为新型的企业融资工具，以其针对性和灵活性更适合中小微企业，却并未完全发挥出它的支持力度，因此在服务中小微实体企业上，融资租赁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发展初期，云城租赁认识到，不动产作为实体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资产规模大，市场价值高，却在相当程度上被固化，未能用到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融资租赁可以将企业不动产作为标的物进行售后回租，帮助企业盘活资产，释放流动性。认识到制约不动产售后回租开展的瓶颈所在之后，云城租赁 2016 年通过校企合作，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合作成立课题组，专门研究不动产融资租赁的税收政策问题，并形成学术研究报告，为税务政策制定部门政策修订提供参考。

其后，云城租赁一直与主管部门保持专业研讨，在业内广泛交流经验，经过三五年的业务深耕和沉淀，在 2020 年终于实现了这笔不动产售后回租的具体项目落地，办理完成过户。

据介绍，云城租赁的不动产售后回租业务，从政策理论上的研讨到实践项目的落地，是创新与实践的探索结果。案例项目依照国家相关税收政策完税，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最终落实交易放款，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操作，有效防范项目的合规性风险和法律风险，对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对于较长合同期限内的交易风险也能起到有力的对冲作用。

该项目在过户办理过程中，切实享受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税务政策，疏通了制约不动产售后回租业务发展的瓶颈，在业务实践的合规性和合理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对今后该行业此类项目的办理具有样板参照意义。其应用性还体现在：一是税务部门对相关政策执行的可参照性；二是企业通过不动产进行融资租赁的可复制性。

对广大实体企业来说，通过不动产进行融资租赁有了可行的参照案例，在传统信贷融资之外，又增加了一种强有力的融资手段，有力地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云城租赁相关负责人表示，融资租赁行进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正道上，有力促进产融结合。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融资租赁通过“滴灌式”的精准服务，打通融资难的“最后一公里”，畅通企业融资渠道。云城租赁 6 年多的业务实践和案例生动阐释了融资租赁服务中小微企业体现出来的优势和作用。在国家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下，融资租赁将在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作者：云融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21-3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应重点推进三个体系建设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近期,《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外发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参与了文件的起草研究,他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意义重大,可以一举多得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多个重大难题,下一步要重点推进生产、流通贸易、消费三个体系的建设。同时提供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法律法规政策制定三方面的支撑。

1 中国经济时报:《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李佐军: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国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如何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内涵十分丰富,融合了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融合了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融合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抓住它就可以一举多得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多个重大难题。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意义重大,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途径,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形象的重要手段。

2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在此时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李佐军: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建立绿色生产体系、绿色流通贸易体系、绿色消费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进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然有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包括绿色低碳产业结构有待形成、绿色流通贸易体系尚未建立、绿色消费还处于起步之中、基础设施尚待绿色升级、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还有很多短板、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制度政策体系亟待健全,因此,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十分迫切。

3 中国经济时报:应当如何推进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李佐军:《指导意见》提到了五个体系,其中主体任务部分主要是生产、流通贸易、消费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是社会再生产的三个基本环节,要重点推进三个体系的建设。同时,还要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提供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法律法规政策制定三方面的支撑。

第一,要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从现有三次产业的转型升级来说,要推进工业绿色升级,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从新兴绿色产业发展来说,要不断壮大绿

色环保等产业，着力构建支撑绿色产业发展的绿色供应链。从产业的布局优化来说，要提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水平。

第二，要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贸易体系。在绿色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要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加强物流运输组织管理，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鼓励发展智慧仓储、智慧运输等。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方面，要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和再生资源回收融合发展，加快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鼓励企业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回收，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等。在绿色贸易体系建设方面，要积极优化贸易结构，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绿色贸易标准合作等。

第三，要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一方面，要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特别是要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引导社会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管理，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特别是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过度包装治理，积极引导绿色出行，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等。

作者：张一鸣

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2021-3

探索合理有效的数据产权制度

近日，由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一期“数据治理论坛”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数据产权与法治保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1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周汉华：探索数字经济与数据治理规律

目前中央文件已经明确了数据产权的概念，通过制度建设推动数字中国的建设和数字经济法的发展，对于促进数据开发利用、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构建有序流动的数据市场格局、提高公民数据权益的保护意识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数据产权法治保障的关键问题在于路径选择。对此，我国数据法制已经通过司法裁判、市场竞争、社会规范等不同方式展开积极探索，未来将在国际普遍经验和中国国情融合、公法私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治理规律的中国方案。

2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周辉：充分保护各方主体的权益

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再次明确了“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的任务。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符合国家数据安全大局需要，契合用户权益保护需要，适应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如何推进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在不同学科、不同场景下进行细化深入研究，广泛听取各类主体产权保护诉求和意见建议。衡量数据产权制度建设路径是否正确、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国家竞争的优势方向，能否充分保护好国家、社会、用户、企业等不同方面主体的权益，能否充分发挥市场主体有序开发、创新利用数据价值的积极性，能否充分考虑制度实施的可操作性和面对技术迭代发展的适应性。

3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刘灿华：加强数据产权的基础性研究

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有四个基础问题需要加强研究、凝聚共识。一是“数据产权”的定位问题，即“数据产权”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还是独立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的新型权利类型？二是“数据产权”的定义问题。对于一项正在发展中的“权利”，应当参考民法典对“知识产权”的定义方式，规定一个相对开放的定义，防止对“数据产权”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三是“数据产权”制度的体系问题。在进行立法时，既要考虑是否要对“数据”进行分类、“数据产权”之下是否有多种权利，也要考虑围绕“数据产权”有哪些行为类型需要进行规制。四是“数据产权”的保护方式问题。为达到良法善治的效果，需要寻求民事保护、行政保护和刑事保护这三种保护路径的有效平衡。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庆华：数据产权制度具有根本性意义

数据产权本质上涉及到在个人、企业、国家三个主体之间的权利分配，是数据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规则，对激活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不仅要从经济学还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量数据确权。对个人而言，在公法上个人对数据具有个人自决权，在私法上可表现为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与人格权。对于企业而言，目前在立法上缺少企业数据权属的规定，未来相关制度建设需要在权利确认与促进数据流通方面实现平衡。

在数据确权的过程中，企业会实现从数据的控制者到数据的占有者的跃迁，但是，由于缺少数据占有者权利的法理基础，现实意义上的数据控制者并不当然等同于民法意义上数据占有者，数据处理也不能直接对应于民法上的处分权。在数据确权的同时要考虑言论权利、科学研究等数据使用的豁免情形。对国家而言，目前存在数据国有化的主张，但政府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开放公共数据、维护数据安全的底线、在数字市场失灵时进行有效监管，在一般意义上不应成为数据确权过程中与个人、企业并行的权属上的竞争者。

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全面充分思考法律意义的数字产权

经济学意义上的数据产权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实际上是有差别的，提出前者并不必然要求创制后者，特别是创制所有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实际上，法律对数据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合同性权益的保护，通过商业秘密保护，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法律对平台数据收集、整理过程中形成的财产性利益的保护，都可以视为保护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数据产权。

当下，有观点提出，现行的法律制度还存在缺陷，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出数据财产权。但是，需要认识到，相应的提议和分析还是非常初步的，远远没有形成共识。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也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实际上，数据承载信息，而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经济发展甚至整个文明的延续都极其重要。它从自身特性来说也是非竞争的，一个主体使用并不影响其他主体使用。通过法律创造一种对这种信息的排他性权益，必须有非常坚实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在进行全面、充分、系统评估的基础上，来思考法律意义上的数据产权，来思考相互竞争的法益如何平衡。赋予企业相应的数据财产权，其法理基础是什么？与其他权益如个人对自己信息的权益如何平衡？会不会强化某些主体的垄断地位因而与当下的反垄断政策取向产生冲突？会不会反而会阻碍数据的充分利用？

6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张效羽：在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提

高数据利用效率

围绕数据产权的讨论，要首先立足实际情况厘清数据产权制度的本意。在没有数据产权制度的时候，数据分属于不同的平台经营者或数字经济巨头，平台经营者只能依靠自行设置数据流动障碍来限制竞争对手对其数据的有效利用，进而导致互联网世界数据分割严重。因此，设置数据产权，本意应该是消除数据利用的障碍、促进数据有效利用，让掌握大量数据的平台经营者能够放心地将数据拿出来，获得法律保障的数据分享收益。具体数据产权制度的建立路径，建议还是走司法先行、行政跟进、立法总结的路径。不要着急立法，先通过司法积累一些实际发生的关于数据利用的争议案件，形成一般的裁判规则。然后建立国家统一的数据利用规制行政机构，先将数据利用的基本规则确立下来。最后，通过总结司法经验和行政规制经验，制定数据利用法，确立数据产权制度。世界的未来属于在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更善于利用数据的国家，而不是将数据封闭起来束之高阁的国家。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制度，最终落脚点应该是在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努力提高数据利用效率、推动数据权益的有序流动。

7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副教授王静：数据确权制度仍有待实践

数据确权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祉，数据确权的制度设计及其保护模式的确定需要留待实践的检验和调整，应结合数据使用的具体场景加以讨论。在不涉及个人隐私、数据滥用以及公共利益的框架下，政府对信息的收集、利用、共享、开放比个人信息的自决权要更重要。实践中政府在数据共享方面协调不力，难以实现数据的有效开放与利用。站在数据产权的国际视角，跨境数据流动表面上是数据的自由流动和安全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担忧在具有较强算法能力之前无法解决数据流失问题的困境，是各国对数据资源的争夺与竞争。而在这一激烈竞争中，常规的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手段，如审批、备案、备份等对数据资源的保护的有效程度不同。

8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万方：建立数据集体产权制度

应根据数据流通的不同阶段确立各主体的数据权利，建立数据集体产权制度，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数据集体产权制度是指数据主体以及数据处理流程中的全部参与者集体所有数据的制度。数据区别于一般物的不可分性决定了主体之间无从完全切断相互关联，尤其是对数据所有权最后的处分“删除权”之行使，必须由整个数据处理主体共同施行方可实现。数据集体所有下的数据控制者对数据没有排他性的支配权，可以将其控制的数据进行市场交易，并实现利益共享。这种利益共享模式与传统的按份或平均分配模式不同，由于数据性质的特殊性及各主体介入的时间不同，因此数据交易中的利益共享模式是链条状，即各主体获得的利益是由其处于链条的位置而存在差异性。数据集体产权制度将数据限定在了集体范围内的有序流动，这给企业带来了相对稳定的预期。在此范围内，企业可以决定是否将其控制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加工，以获得更多的数据权利，即企业可以自行控制投入数据处理的资源。另外，数据集体产权制度为数据的本地化存储和跨境交易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和限制，可维护我国的网络主权。

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数据法学研究院院长苏宇：探索不同于传统的数据产权模式

数据产权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数据产权保护制度主要应采取权利规则模式还是行为规则模式。目前，数据的许多相关法益难以用权利的概念刻画，全球范围内有关数据处理活动的既有权利束不能准确刻画数据保护制度的全貌。在数据保护的实践中，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制的保护等非权属类保护的方式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数据产权配置上，可以进一步探索与传统几种产权不同的数据产权模式，即在保护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等法益的基础上，采取弱自主、强利他的产权模式。

10 中国信通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婕：以流通共享为关键活跃数据要素市场

在个人数据权利体系高度完善的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数据权属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在规定个人和企业对于数据的权利时，美欧纷纷回避了对数据权属的界定。对数据法律属性认知的莫衷一是，证明了两点：一方面，数据法律属性的界定是世界各国面临的理论难题；另一方面，厘清“数据权属”并非界定“数据权利”的必然前提。目前，应当走向破局的关键，即搁置数据权属争议，以流通共享为关键活跃数据要素市场，转向数据共益性的研究，通过多方的市场参与，形成价值生成的市场共识规则，平衡各主体对数据享有的权益，建立有序的数据流通的共享机制。

作者：金灿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3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1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 激发内生动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年会经济峰会于 3 月 20 日召开，在“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单元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席教授周其仁，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等就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展开讨论。

周其仁表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三农”问题得到很大改善和提高，但农业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三农”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他认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明确乡村振兴的潜力、及时解决制约潜力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乡村振兴的潜力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这样才能把“三农”问题解决好。周其仁提出，应该重点从三方面激发乡村振兴的潜力。

一是现在人民追求高质量美好生活，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旺盛，但我们的一些高质量农产品对国外市场有依赖，这就对国内农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国内现在有 600 多座城市，这是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国内农业如何更好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对于激发乡村振兴潜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乡村振兴要激活乡村休闲度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乐意去乡村度假旅游，但乡村旅游设施配套不足，影响了乡村旅游。这方面是今后乡村振兴需要激发的潜力。

三是新技术可以在农业、农村中找到应用场景。如果科技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就会极大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收入。

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视频发言中表示，中国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的

“十四五”期间还将在此领域取得更多新进展。中国现在的农村人口还是非常庞大，有 5 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有 2 亿多农民进城务工。虽然，中国农村地区具有基本的义务教育，但在农村地区想要获得一流教育还很困难，中国现在有强大需求去改善农村教育质量，要做到这一点在全球来讲也不易。

珀金斯认为，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农村一流教育，可以通过政府建设具有优秀师资的学校，从而让这些学生接受一流教育。中国能否解决好农村教育问题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刘守英表示，现在对乡村振兴的讨论越来越热，但是一些现象需要引起关注。一是现在农村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还有“70 后”农村进城打工人员，如果在城市留不下来，回到农村干什么？这些人基本没从事过农业，也没种过地。二是现在农业越来越单一，回报低。虽然有些地区也进行了土地流转，但是从事规模化种植依然没有实现高收入，农业回报越来越低致使市场要素不愿意进入农业领域。三是原来传统农耕村落的聚集形态开始向更交通便利的地方转变。四是进城务工农民积累的资金还是回农村盖房子。这些问题看上去是乡村问题，实际上是城市化模式问题。

刘守英认为，现在应该重点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供给极其缺乏，完全依靠政府提供也有困难，需要政府和市场更好结合。尽快解决农业回报低、农业单一化、农业要素组合缺乏的问题，农业需要一场要素重组革命：首先是农村土地问题，其次是农业经营者成长，最后是农业要素重组。

刘永好表示，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民营企业应该做什么？

刘永好说，新希望集团刚刚制定“五五工程”战略——计划从今年开始用五年时间将在农业领域投资 500 亿元；招收从事农业产业的 5 万名员工，为解决乡村就业作出贡献；义务培训 5 万名新农人，包括乡村技术人员、种植业和养殖业能手等；发挥企业 40 多年来建立起来的网络和资金优势，帮扶 5 万个小微企业；在全国建设 5 个乡村振兴示范基地。

刘永好认为，同时要发挥光彩事业组织的作用和力量，通过民营企业家的联合行动，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起到积极作用。

刘永好表示，国家倡导共同富裕，企业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拥有相当的经济能力和经验，企业家应该以实际行动帮助落后地区，贡献民营企业应有的力量。

2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 释放消费新势能应该这么做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强大国内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底气所在。新时期，如何更进一步地释放消费新势能？在 3 月 20 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年会经济峰会上，多位专家、企业家围绕这一议题出谋划策。

“释放消费新势能，可以从优化税收结构的角度着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率先发言表示，一方面，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18 个间接税税种的税收量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约在 70% 左右。间接税是累退税，收入越高的人，在间接税的负担上所承受的比例相对越低，而收入越低的人，承受的比例就会越高。这样一种累退税显然不利于扩大消费。另一方面，价格一般由成本、利润加上间接税决定，若间接税的比重增大，则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就高，这无疑会抑制消费。此外，若间接税占比变高，则直接税的占比将变低，这就意味着整个税收用于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渠道相对狭窄。因此，释放消费新势能，就要完善直接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以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消费成本，从而有助于扩大消费。

对于通过优化税收结构来释放消费新势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强调，目前我国直接税征收在流量方面所占比重

较高，而在存量方面，对于资产，比如房产税、遗产税等政策迟迟没有出台。“这一方面政策如果出台的话，可能直接税的作用也就更大一些。”

除从税收结构着手外，在消费群体方面，宋晓梧还表示，在低收入群体里面，要给予农民工群体高度重视。“以 2019 年的数据来看，2.9 亿农民工占我国 4.4 亿城镇就业人员的 66%左右。一个农民工家庭按三口人算，就将近影响到七八亿人的消费，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值得重视。”宋晓梧说。

事实上，我国有近 14 亿人口、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随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断完善，消费政策、消费环境持续优化，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内需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作用势必会越来越凸显。不难想象，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从超大劳动人口到超大消费人口，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强劲的消费能力，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贡献将是空前的、全方位的。

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又该从哪些领域进一步释放消费新势能呢？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明在发言中表示，未来进一步释放消费势能，可重点关注四类消费增量。

一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增量。如果“十四五”时期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5%，就意味着每年进城人数仍将达到 1000 万级的规模，加上人口加速向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转移，由此带来的购物、医疗、教育、住房等消费需求仍将巨大。

二是供给能力提升带来的增量。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必须持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如果供给质量和效率不高，势必会影响需求的发掘和拓展。从这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来看，围绕“三去一降一补”，重点对过剩产能、低品质产品、低效益企业加快清理和出清，有效提升了供给水平。

三是消费结构优化带来的增量。在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以及消费观念转变的带动下，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功能性、多样性、个性化、定制化等需求特征趋于明显。老龄群体扩大，医疗保健、健康养老、社区服务、休闲娱乐等银发经济空前繁荣。

四是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增量。大数据、物联网、5G、智能制造等新技术不断涌现、高速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又为新技术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从网约车到共享单车，从电商购物到网络众筹，从移动支付到扫码点餐，由新技术带来的消费新业态在中国集聚爆发，个中潜力值得深挖。

对于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市场潜力和前景，物美集团创始人、多点 Dmall 董事长张文中深表赞同。同时，对于零售企业该如何趁此东风做大规模，张文中认为，中国零售企业基础比较薄弱，单一企业总体规模较小，因此，零售企业需要抱团取暖。而要做大规模、提升竞争力，则必须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而且要彻底数字化。

3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 良性的科技合作与竞争并存是新趋势

3 月 20 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年会经济峰会在京举行。在“全球科技创新：塑造合作与竞争新规则”单元，中外专家就如何建立适应科技创新合作和竞争新规则展开了讨论。

“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已进入一个非常空前的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了全球科创版图和

产业链，各国从科技创新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与此同时，竞争的优势和安全的需求变得非常迫切。”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表示。

科技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黄卫认为，科技推动生产力产生了巨大飞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从世界科技革命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多国加大了科技创新的投入，力争提升后疫情时代的科技实力。全球疫情引发国际合作模式和产业变革，跨国创新联盟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科技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需求变得迫切，中国是国际合作的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未来形成良性的科技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需求。

黄卫指出，我国强调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的能力，与国际的合作开放是不矛盾的，而是统一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上的自强自立以及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是必须要做到的。如果中国的产业链不能自主可控，就没用能力服务好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不能服务好 14 亿人口。而如果我们做好了，就能够具有更好的能力来跟世界各国开展产业和科技的合作，就可以更好地与发达的经济体进行合作，也更有能力和不发达的经济体进行合作。”

《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从 1979 年到 2019 年是中美 40 年的合作篇章，在此期间，双方是无意识的融合，中国的投资者、学生可以到美国来，美国的创新者和学生也可以到中国来。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世界，必须要重新定义中美接下来 40 年的经济关系和技术关系，中美双方必须共建信心。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认为，过去这些年全世界的创新领域有两个重大变化。其中，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影响到日常生活，而且在方方面面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据薛澜介绍，近年中国的创新领域迅速崛起，在研发投入、专利授予量、科学论文数量等指标都逐渐接近国际水平。美国科学艺术学院的数据显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在研发支出上差异约每年 3000 亿美元，但近年中国的总支出已经逼近美国，达到每年约 7000 亿美元。实际上，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科技界对全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授予中国的专利也超出了美国和其他国家。

在薛澜看来，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最核心的原因是改革开放，政府干预恰恰把中国科技系统从一个以计划经济为基础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创新系统。中国创新全社会的投入 3/4 都是企业的投入，政府大力推动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而且今天改革还在继续。中国一直在跟全世界的科技界融合，全世界的发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性的议事规则对创新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在公平竞争、协同发展的趋势下解决全球科技创新合作与创新问题？薛澜认为，首先要把事实理清楚。其次，有些规则可以继续遵守改进，另一些新规则需要共同讨论，重新制定。

弘毅投资董事长、总裁赵令欢认为，从一个非常高效的全球制造者，到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全球市场，现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全球技术领袖和创新领袖，这是过去协作的现实。

对于全球科技创新如何塑造合作和竞争的新规则，赵令欢认为，第一，数字化改变了世界，世界是相互联系，脱钩是做不到的。世界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很有建设性，而且能够有非常深的基础。

第二，通过贸易战来解决贸易不平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打技术战是不符合逻辑和事实的，也不符合科学规律，技术只有通过协作才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第三，目前遇到的全球化问题、经济问题，是需要国际合作的。世界各国一起来制定共同接受的规则并要遵循。

“科技创新正在推动人类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公共卫生、粮食安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环境污染等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非常大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哪个经济体能够独善其身、独自完善、独立发展，世界正在发生凝聚共识、包容竞争、合作发展的关键阶段，只有通力合作，人类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杨宇东表示。

作者：范思立、胡畔、李晓红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21-3

长三角一体化发力“高铁工程师”加速皖北 “洼地创新”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各类创新资源正在打破地域壁垒、加速流向欠发达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安徽省北部的阜阳、蚌埠、淮北等地采访了解到，这些昔日的“发展洼地”正从“产业承接”迈向“创新融入”，通过引进苏浙沪的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利用“高铁工程师”的红利，培育起硅基、陶铝等产业跃升型、换道超车型、网络聚变升级型等数个百亿元规模创新产业集群。



1 “发展洼地”内生型产业集群崛起

记者在皖北地区看到，多地并未因交通条件改善而坐等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而是主动嵌入发达地区的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为长三角一体化增加“安徽动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产业集群均为内生型。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不再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优势的放大，主要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等创新要素的聚拢，是一种创新型的产业集聚，其主要的形态有产业跃升型、换道超车型和网络聚变升级型三种。

——产业跃升型：创新成果集簇涌现，因果累积效应之下，产业跃迁升级。蚌埠市发改委副主任韩玉军介绍，围绕国家显示面板关键原材料的战略需求，解决“卡脖子”关键问题，蚌埠市着力进行新型显示、光伏玻璃、特种玻璃和泛石英材料的全产业链布局，近年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在蚌埠市，继 2018 年生产出世界上最薄的 0.12 毫米超薄玻璃，2019 年下线浮法 8.5 代液晶显示玻璃基板后，2020 年又研发出 30 微米柔性可折叠玻璃，形成全国产业化超薄柔性玻璃产业链。自主研发生产国内首片高品质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管，并荣获“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目前，蚌埠市正全力打造千亿级硅基新材料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换道超车型：突破前沿核心技术，培育发展高端产业。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坚持把陶铝新材料产业作为引领产业升级的突破口，通过引入上海交通大学王浩伟教授团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快速培育起一个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金属材料产业基地，目前，已形成以陶铝新材料、铝

型材、铝箔精深加工为主导，新能源等产业延深的集群。基地现有涉铝企业 80 余家，规模以上企业 57 家，其中仅 2020 年就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17 家。王浩伟表示，相关产能正逐步释放，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汽车等领域。2020 年，基地产值预计突破 160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6%。

蚌埠市通过聚乳酸技术打造的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全面掌握了国际领先的聚乳酸上下游产业生产技术，2019 年建成世界首条千吨级聚乳酸纤维生产线，成功试车投产年产 5000 吨乳酸、3000 吨聚乳酸产业化示范线，首批聚乳酸产品在蚌埠下线。2020 年 8 月，年产 5 万吨聚乳酸项目实现量产，吸引 200 多家企业洽谈合作，一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骤然兴起。

——网络聚变升级型：“传统网络+先进制造”推进产业聚变升级。已脱贫摘帽的阜阳市界首市，利用废电瓶、废塑料、废铜铝等收集网络，推动资源循环高端化加工与集聚化升级，打造全国最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专业园区和重要再生塑料集散地、铝基新材料加工基地。在此基础上，界首市大力发展泡沫铝、改性塑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入驻企业 130 多家，实现产值 150 多亿元。

2 “高铁工程师”激活洼地创新动能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推进，以及高铁网的全覆盖，皖北后发地区享受到了“高铁工程师”等一体化红利，共享区域创新资源，科技成果异地转化的速度和效能大为提升，促进了要素的快速流动。

“以前到阜阳出差，不是坐飞机就是开车。如果开车，早上出发，晚上才能到，整个旅途比较累。”上海强松集团研发部门负责人秦心华深有感触地说，从上海到阜阳的高铁开通后，出差基本都坐高铁了。

秦心华是一位“高铁工程师”。他所在的上海强松集团 2012 年在阜阳建立生产基地，从事机械叶片、汽车轴承等生产，2018 年投入 3 亿元转型为航空和军工电子、电源模块等生产商，实现了从产业转移到技术转移的转变。

无线充电电源、幕墙铝单板、折弯机……在阜阳市颍泉区阜阳循环经济园，上海强松集团的各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上海强松集团（安徽）总经理袁同发介绍，2020 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近 2 亿元，同比增长约 40%，其中转型后的新产品占到六成左右。公司成功转型的背后，是一批“高铁工程师”的支撑。目前，公司正谋划和上海交大共建创新研究院、新型研发中心，预计将派驻 20 名以上技术专家。“高铁开通后，从上海坐高铁到阜阳，最快只需要 3 个多小时，专家往返很方便，有助于更好地交流。”袁同发说。

“新生产线试生产时，或者新产品导入时，我就会从上海坐高铁到阜阳，直接到现场解决相关技术难题。”秦心华说，难题解决后，他再坐高铁回去。现在公司里像他一样的“高铁工程师”有 10 多位。

高铁时代不仅带来“高铁工程师”，而且带来一批批招商引资项目，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记者从阜阳市政府了解到，2020 年初举行的“融入长三角·高铁全覆盖”阜阳市情推介暨招商恳谈会上，全市签约长三角地区项目 47 个，其中产业类项目 29 个、总投资 442.75 亿元。

在界首，吉祥三宝高科纺织有限公司和东华大学俞建勇院士团队“结亲”，于 2017 年成立院士工作站，从一家被服厂转型为从事特种服装生产和新材料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荣小瑛说，转型前公司生存岌岌可危，如今年产值超 3 亿元。在界首，院士工作站已有 8 个。

记者在蚌埠高新区走访了解到，该区围绕太阳能玻璃、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与中科院、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健全与长三角高端科技人才、专家互访资源共享交流

机制，通过借力长三角“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世界级硅基产业基地。

为加快科技成果落地，皖北各地还探索“试验室—中试—新兴产业”的一条龙服务，“短流程”转化。上海交大王浩伟团队纳米陶瓷铝合金项目 2013 年中试期间，淮北市政府给予了土地、资金、政策和人才等支持，形成了具有年产千吨级中试及生产基地，2017 年又成立了政产学研合作的公司，加快了新材料产业化的步伐。

3 “科技嫁接”实现创新资源为我所用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已经成为皖北各地政府的自觉。“我们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共同体建设，与上海市松江区、徐汇区政府及上海科学院、江南大学等合作全面展开。颍东区与浙江大学共建的浙江大学技术转移中心颍东工作站等 10 余个合作共建项目加快推进。”阜阳市科技局调研员刁微波说。

2019 年，界首（上海）离岸科创中心成立，为安徽首个。阜阳市政协副主席、界首市委书记徐会东说，融入长三角，要根据自身优势精准定位、互相补充，科技嫁接就能实现长三角优质资源为我所用，这是最大的红利。

受访人士认为，皖北地区要把握国家战略机遇，坚持走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和转移新路，逐步培育更多的百亿元产业集群，做大经济规模，力争在经济总量上“再造一个新安徽”，当前亟须加快前沿“卡脖子”技术联合攻关，围绕新兴产业前沿，产业界和科学界、“发展洼地”与创新资源富集地联合协同，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为此，韩玉军建议，国家层面应科学规划、加强布局，依据欠发达地区产业技术和资源禀赋，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通过“技术引流”增强发展的异质性，形成差异化发展新格局，避免盲目发展造成资源分散现象。

同时，鼓励离岸科创中心等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精准支持新兴产业领域自主创新企业。刁微波表示，在科技专项、产业发展专项等产业政策上，应鼓励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技术成果转化平台，扶持上游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企业，给予关键材料和装备国产化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联合开发项目或设立“卡脖子”技术推广应用风险基金等方式，提升下游企业使用国产化产品的积极性。

此外，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基层呼吁，上级应布局与新兴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高等院校，培训、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地方干部、技术和应用人才。阜阳市常委、临泉县委书记邓真晓建议，在皖北中心城市新设应用、研究相结合的高等院校，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力度，使地方干部具备把技术转化为产业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并成为研发、应用人才培育基地，输出更多产业人才，促进皖北高质量发展。

作者：汪延、杨玉华、姜刚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3

专业科技保险为重点创新项目装上“安全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更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源大量涌向芯片、人工智能等前沿竞争领域。记者调研发现，风险投资和科创板解决了科创投入的“回报”问题，但要加大基础科研投入、进一步突破“卡脖子”技术，还需要搬走压在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头上的风险“大山”。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过专业科技保险等金融工具，用金融创新打通科技创新，是真正实现“四个面向”、激发从 0 到 1 原始创新的有效途径。



1 核心创新缺乏“安全垫” 科创风险痛点待除

我国科技实力实现质的飞跃的同时，科技创新资源分散、低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不足，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滞后于总体进展等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尤其是重大原始创新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和风险，始终是压在科研人员头上的一座“大山”。

人工智能企业云从科技的创始人周曦表示，对于投身创业的科学家来说，风险点贯穿前期投入和后续融资的各个环节。在初创阶段，科研人员需要拿出全部身家投入创业，境况困难；后续融资阶段，不少风投机构会要求科创企业管理团队签订对赌协议，“风投机构没风险”是当前科创融资的悖论，对于科技创业者来说却背负了几重枷锁。

周曦认为，当前科技竞争越来越依赖核心的基础研究层，这个层面的问题跟平台层、外围应用层要区别对待。核心“卡脖子”技术不能用盈利思路来解决，在追求高回报的风险投资之外，需要

保险等金融力量介入，建立相对标准化、全覆盖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

中国太保产险相关人士坦言，未能建立科研全链条全方位保障体系、科技与金融衔接融合不足、科创生态所需市场化衔接手段不足是当前科创保障的三大痛点。

“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不确定性更高、风险更大的科研产业需要更充分的金融保险安排。”该相关人士表示，一是由于科创风险的高风险性和长尾性，难以纳入综合性保险公司常规风险偏好选择范围；二是传统保障方式导致实际保障能力有限，传统的以保费决定经济赔偿的保障方式难以满足科技创新主体的实际保障需求；三是风险分散不足导致发展意愿不强，传统销售端承接意愿不强，同时由于缺乏兜底性的“安全垫”，保险公司大规模多元化提供产品供给的意愿不强。

2 引入全周期、全链条科技保险 撬动创新“支点”

2020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指出，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要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业内人士建议，科技与金融保险的深度融合或将是撬动问题解决的“支点”，设立专业性科技保险公司具有多重优势。

首先，将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机衔接。为完善科技和金融保险的结合机制，充分发挥保险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助推作用，需要探索发展新型科技保险服务组织和服务模式，建立适应创新链需求的科技保险服务体系。这要求保险企业深度介入到科研主体的研究、开发、转化等各环节，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和专业服务，增强保险服务科技创新的功能。

“对于科创企业来说，金融保险的专业性将帮助科技工作者实现经营管理的流程化和标准化，对于企业风险的判断将更加明晰，也更利于吸引社会资本。”周曦说。

其次，有助于激发科技主体自主创新的动力，形成全方位全覆盖的保障体系。设立专业性科技保险公司，有助于促进对科技创新全领域的风险研究，拓展科技产业相关主体的保障广度，形成全方位全覆盖的保障体系。

有保险业内人士表示，“全链条全方位”应对两个特点，分别是全生命周期和“大中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全服务。专业性科技保险将科技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风险颗粒化，并着力于为每一个颗粒化的风险保障需求提供传统商业保险无法覆盖的解决方案。同时，专业性科技保险将解决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科研人员创业失败后的生活保障、科创企业管理团队的个人家庭资产保护等痛点，尤其是服务广大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他们承担了创新基础能力培育等任务，但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更难获得金融支持和保障。

最后，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创新，提升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设立专业性科技保险公司，有助于以市场化形式承接政府科技创新治理职能转变的部分内容，提高政策支持效率，合理配置资源，健全政府统筹协调的科技宏观决策机制，大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以上海推进的科技贷款履约保险为例，发生贷款损失后，政府、银行、保险按照25:30:45的比例逐笔承担风险责任，当政府赔偿金额累计达到实际贷款金额的3%后，超过部分的风险责任由银行承担。自科技贷开展以来至2020年上半年，上海保险业累计为2825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支持贷款金额104.76亿元，撬动作用十分明显。

3 政策土壤+产业土壤 构建中国科创“出海口”

科技工作者和金融业内人士认为，专业性科技保险公司的设立具有可行性，在国家科技创新驱动

战略的引领下，改革创新的政策土壤与监管方式，将给专业性科技保险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家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为专业性科技保险公司提供广阔持续的市场前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 2020 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其中，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近年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中，金融杠杆给予了重大支持。

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为例，来自上海银保监局的数据显示，上海保险业为中国商飞、国核自仪等高端制造企业提供首台（套）风险保障，为国产飞机顺利完成首飞和商业交付作出突出贡献。截至 2020 年上半年，上海共完成 210 个重点创新项目承保，累积提供风险保障 382.67 亿元，提供赔款约 3.25 亿元。上海市生物医药临床试验责任保险和药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 2 年多来，已服务 78 家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超过 10.77 亿元。

上海科创中心和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为发展专业性科技保险提供了创新开拓的政策土壤和产业土壤。“探索科技金融支撑有力的创新体系，上海有着天然的优势。在科创中心建设、自贸区、科创板等国家战略支持下，上海张江、临港等板块已经形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优势产业布局，中国的科技‘出海口’在上海。”周曦表示，接下来可以结合产业链优势，探索专业科技保险体系，与以科创板为代表的创投体系形成两翼齐飞、相互支撑的科创金融保障体系。

银保监会引导金融行业保障科创企业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改革的监管空间。2006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大力推动科技保险创新发展，提升保险行业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中的保障作用。复旦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许闲表示，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导向，除了要求其回归保障本源，也意味着从更高层面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发展专业性科技保险可以成为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配套改革探索。

作者：姜微、姚玉洁、王默玲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3

促进文化娱乐线上消费创新发展

“互联网+”助力文化娱乐产业新业态和新场景，创新消费新需求。通过提高居民线上文化体验感，满足居民文化需求多元化，让人们愿意为更好的文化体验支付。线上文化娱乐体验不仅满足大中城市居民生活需要，同时也满足了偏远农村居民生活多元化的需求，这种消费结构多层面、多梯度提升的趋势释放了居民巨大的内需潜力，为扩大内需带来持续性拉动力。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线上线下全渠道满足消费需求”，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激发新型消费内生动力。同时，规划纲要还明确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按照规划纲要精神，要加快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特别是要积极有序引导文化娱乐线上消费，创新文化娱乐线上消费方式，以此激励城乡居民消费新需求和推进消费转型升级。

1 文化娱乐线上消费 激活消费需求新动能

“互联网+”助力文化娱乐产业新业态和新场景，创新消费新需求。“互联网+”助力文化娱乐产

业新业态、新场景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不再是小众的自娱自乐，而是大众的文化盛宴。通过提高居民线上文化体验感，满足居民文化需求多元化，让人们愿意为更好的文化体验支付。线上文化娱乐体验不仅满足大中城市居民生活需要，同时也满足了偏远农村居民生活多元化的需求，这种消费结构多层面、多梯度提升的趋势释放了居民巨大的内需潜力，为扩大内需带来持续性拉动力。

文化娱乐与科技跨界创新融合，促进居民消费转型升级。文化娱乐线上消费需吸纳现代科技的思想、技术成果，运用新的思维模式，开辟出“多线进化”、“立体发展”和特色优化发展的新路径。构建以 IP 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方式，打造更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以漫画、动画、游戏为载体，激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用数字创意的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身体力行的践行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与使命。这种文化 IP+知识+科技+互动的娱乐方式，比起平铺直叙，技术简单、情节易猜的影视或游戏表现形式，更易影响青少年及高知人群，其内容影响力巨大，乃至风靡全世界。以创意融合驱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成为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是全面促进消费，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的有力支撑。

2 我国文化娱乐线上消费的主要瓶颈

一是科技发展速度与产业发展速度不匹配。文化娱乐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科技+”与“文化娱乐+”协同创新，是两者在本性上的相互切近，它既需要科技的整合性与能动性，更需要文化的集成与价值的提炼与创新。与发达国家文化娱乐产业数字化发展相比，我国在关键技术创新和某些核心技术应用上仍有较大差距，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动漫游戏、全息影像等与“互联网+”的应用还未在文化娱乐产业新发展模式中普及，新兴文化业态还需不断更新。技术产业化与文化产业化交互发展需要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内容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有效提升文化产品的附加值。需要利用“文化娱乐+互联网+”的新型平台，促进文化与旅游、科技、金融、生态农业、智能制造等行业的融合发展。

二是文化娱乐业市场定位与细分意识不强。集中化发展可以带来更好的服务质量，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升级后的服务消费需求，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更专业化的供给。但从目前行业发展现状来看，文化娱乐线上消费模式尚不成熟，各大商业模式竞相出现，市场鱼龙混杂，争夺“流量”。市场定位不明确，细分意识不强，各大平台产品雷同，没有核心竞争力。以直播平台为例，综合类、生活类、游戏类、购物类、知识分享类直播平台均有多款软件，且种类交叉重叠。面对如此多的平台，如何细分市场，定位客户需求差异，提升客户的长期粘性，培养客户的数字付费习惯，是目前国内文化娱乐线上消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是文化娱乐产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文化娱乐产业实施粗放式、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文化娱乐新业态市场化程度低，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源依赖现象严重，文化资源优势尚未转为文化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创新意识不强，避难就易，文化娱乐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资源开发不合理。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科学，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资源配置差距颇大。具体来说，城市地区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城市文化产业人才相对较多，文化娱乐产业生产力相对高，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完善。二是文化产业体系不健全。例如文化遗产中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知割裂，忽视文化遗产本身的生命力和潜在价值空间，保护和开发严重对立。文化行业的体制壁垒、跨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等体制、机制层面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还不够，文化娱乐业与产业经济没有形成协同效应。

四是文化娱乐业数字化发展市场信用监管不力。文化娱乐产业数字化领域创新活跃，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容易导致监管真空，政府监管跟不上行业发展步伐，盗版侵权等失信事件频发。近年来，网络文学、数字音频等领域盗版现象仍然普遍，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淡薄。网络直播领域的极端、

恶性直播事件时有发生，平台恶性竞争和垄断行为屡禁不止。短视频领域盗版改编剪辑电影电视版权作品现象泛滥，各大娱乐、社交平台，服务能力和治理能力良莠不齐，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3 促进文化娱乐线上消费 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首先，提高我国科技研发能力，普及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应用。文化娱乐线上消费融合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普及应用。近些年，动漫游戏、广播电视、出版业等不断融入数字技术，衍生出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网络出版等文化娱乐新业态，数字出版和高端印刷使图书具备了视频、音频等功能，可以按需印刷，形成新的出版业态。实践证明，数字技术的渗透和应用，极大提高了文化产业生产能力和效率。当前，要着力发展 4K/8K 等新媒体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广告创意、网络传播、数字版权等需要的科技支撑和 5G、人工智能、超高速超高清摄像等文化娱乐领域需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避免在核心技术领域被“卡脖子”。

其次，细分文化娱乐产业市场，满足消费者差异需求。更加科学地细分文化娱乐产业市场，既使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其功能的需要及升级后的服务消费需求，又促进市场主体合理地战略定位和配置自身资源，增强市场专业性，降低营销成本。为此，需要努力发掘市场中不同的消费者从现有的供应品中获得不同的满足程度，从消费者年龄、职业、心理等方面列出影响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各项指标，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结合各细分市场上消费者的特点，用形象化、直观化的方法细分市场，打造市场中的特色，形成市场精准定位，满足消费者差异需求。

再次，完善对文化娱乐线上消费的扶持引导机制，引导文化资源和要素合理流动。加快文化娱乐线上消费创新发展，需要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扶持政策，提高政策长效性，特别要重点突出对高科技、高创意、高文化含量文化企业的引导和扶持。通过统筹协调、整合资源，进一步加大对文化创意集居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及高端文化人才培养和引进的资金扶持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文化资源和要素城乡合理流动。通过文化娱乐线上消费重点建设项目的合理性区域布局，平衡区域发展，增强产业辐射力，不断提升产业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示范效应。

第四，推动文、旅、商创新融合发展，拓展消费新领域。以文化娱乐为灵魂、旅游为载体、商业为驱动力，通过合理有效的产业化组织和政策促进，将文化资源潜力转化为旅游魅力和产业实力，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文旅商一体化产业链。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文旅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高速化发展。运用 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影视技术赋能旅游景区线上面对面、旅游产业云讲堂，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名人景区、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等，满足游客不同旅游需求。依托“云+人工智能+5G”等技术，充分利用微信群、小程序、直播、短视频等社交平台吸引潜在客户流量，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运算，根据客户喜好推送体现不同文化特征的景区相关视频及与该景区文化配套的一系列产品，从而激励出新消费需求，不断拓展消费新领域。

第五，优化发展环境，创新数字文化娱乐业监管方式。健全文化娱乐产业知识产权（版权）评估、服务和激励制度，健全知识产权（版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的政策措施。明确数字文化娱乐产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强化行业规范，制定行业标准、交易规则和执法规则，解决行业快速发展与市场监管不匹配的问题。加强数字文化娱乐业市场动态监管，不断创新和规范数字文化娱乐业的监管方式，较好的解决数字文化娱乐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企业信用基础薄弱、失信处罚力度小、信用管理制度和法律不健全、信用监管缺位、盗版侵权严重等问题，创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信用环境，促进我国数字文化娱乐产业经济体健康良性循环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文化娱乐产业在扩大消费需求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陈琳琳 夏杰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3